

明代薛瑄《从政录》告诉你如何为官

□ 王 萍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明代著名理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曾任监察御史、山东提学金事、大理寺少卿等职。薛瑄为官刚直耿介、勤政爱民、廉洁自律，有“清官”美誉。在从政的二十多年间，薛瑄就如何做一个好官、清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积极实践，并且留下了许多经验性论述，其语录体著作《从政录》就是记载其从政感悟的一部经典著作。

清正廉洁

薛瑄认为，为官者当一身正气，正所谓“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意为为官者只有保持一颗正大光明的公心，才能顶住诱惑，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和政治操守。秉持一颗公心，终归还要落到实际行动上，这便是对正义和廉洁的不懈追求。为此，薛瑄主张“为善勿怠，去恶勿疑”，做官当善恶分明，做善事不懈怠，除恶人不犹疑。

对于廉洁问题，薛瑄认为，朝廷官员数目众多，素质参差不齐，在廉洁程度和自觉性上不可能做到整齐划一。因此，薛瑄提出将廉洁划分为三个层次——“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这三个层次中，“见理明而不妄取”，是廉洁的最高境界，也是薛瑄所倡导的廉洁典范，能做到这个层次，就意味着廉洁的理念已经融入了个人的精神世界，从而化为了行动自觉。“尚名节而不苟取”，虽也能做到廉洁，但是主要还是出于维护个人名节的目的，比起前者，在精神境界上就低了一个层次。“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这样的官员保持廉洁，主要是出于对失去官位俸禄和受到律法惩处的畏惧心理，这样的廉洁则是最低的层次，也是最容易被突破底线的层次，一旦失去法律监督，面临巨大诱惑，原本“不敢取”的官员就容易走上贪腐的道路。薛瑄提出了廉洁的三个层次，其主要目的在于让为官者有所对照，认清自己的思想

状态，从而提醒和激励为官者，在廉洁奉上不可有丝毫懈怠，要不断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努力做到“见理明而不妄取”。如此一来，官场方能有清平气象，官民矛盾才能得到缓解，从而实现国泰民安、天下大治。

谦虚谨慎

薛瑄认为，谦虚谨慎是为官从政的重要品德，仕途越是顺利，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不骄不躁。《从政录》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为官应当保持谦虚谨慎的问题。

薛瑄主张，为官者当效法古人，要有虽“功满天地，德冠人群”，也能“视之若无”的思想定力和谦虚心态。在他看来，为官者处理公务皆为分内之事，不论过程如何艰难，事毕之后，不高调宣扬才是最好的做法。“处事了，不形之于言尤妙”，对于那些仅仅妥善处置了一些分内的寻常小事就到处跟人炫耀的官员，薛瑄内心里是非常不齿的，认为这种做法“陋亦甚矣”。此外，薛瑄认为，为官还需要有不计个人功名得失的气魄，“凡事皆当推功让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得自能之意”，如此，方能与同僚下属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更有效地开展工作。

薛瑄认为，为官者要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心态，一言不可不谨，即“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一事不可不慎，即“事最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官员不仅自己要谨言慎行，对于身边人的意见也要仔细分析求证，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左右之言不可轻信，必审是实”。同时，薛瑄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为官疏忽武断的危害，提醒官员们需谨记“轻与必滥取，易信必易疑”。倘若轻易答应别人的要求，为别人提供方便，总有一天也会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若轻信他人的言语，日后也会容易因一点儿小事而心生怀疑，这样的官员仕途不会顺畅，极易出现问题。

勤政为民

薛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于“水能载

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要想实现政通人和，根本在于安民，关键在于治吏。因此，他将“勤政”和“爱民”视为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途径。

薛瑄主张，为官者应时刻牢记自身职责，一日不可懈怠，其云：“作官常知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矣。”意思是说，为官者应常怀忧虑之心，唯恐所作所为不称职、不尽职，有心如此，方能造福一方。倘若为官不尽心履职，反而“剥民以自奉”，借官位来盘剥百姓、中饱私囊，绝不可能是合格的官员。

薛瑄师承孔孟，深受仁政学说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民本思想。主张为政当以爱民为本，认为官员要对百姓怀有仁爱之心，要以恭敬的态度对待百姓，不可以忽视百姓的存在，“作官者于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在封建社会，薛瑄提出要尊重黎民百姓，反对轻视百姓的行为做派，这种立场和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此外，薛瑄还提出了“爱民”的三条途径，即“养民生，复民性，禁民非”。所谓“养民生”，即要轻徭薄赋，维持百姓的正常生活；“复民性”即要对百姓行教化之事，复仁义礼智之性；“禁民非”即要阻止百姓违法乱纪。薛瑄认为，努力做好这三点，让百姓安居乐业，是治理天下的紧要之事。

对于有些官员提出的“官爱民而民不亲官”问题，薛瑄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未至也。”行亲民之事而民不亲，这只能说明官员做得还不够好。“诚能以保赤子之心爱民，则民岂有不亲者哉？”意为只要以保护赤子之心去真心爱护百姓，百姓自然就会爱戴官员。

隐忍宽容

薛瑄认为，隐忍宽容是一种美德，也是官员必备的品质，其云：“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为之事功。”就是说，只有忍得了别人无法忍受的冒犯，才能完成旁人无法完成的事情，才能成就别人无法成就的功业。在薛瑄看来，为官者闭塞视听、好谏恶直是十分危险的，因此他主张为官者要敢于面对他人的批评，防止“闻人毁

己而怒，则誉己者至矣”，倘若一听到别人批评自己就发怒，时间一长，大家就知道这个人只愿意听好话，阿谀奉承的人就会纷至沓来。虽主张要谦和待人，但是薛瑄也指出，谦和要有节制，不能丧失底线，其云：“待下固当谦和，谦和而无节，及纳其侮，所谓重巽吝也。惟和而庄，则人自爱而畏。”即对待下属和百姓要持谦和的态度，但是要把握好分寸尺度，不能毫无原则地迁就纵容，只有保持谦和而庄重的态度，才能让人爱敬敬畏。

薛瑄认为，为官者公务繁多，因而务必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冷静的头脑，这样才能从容不迫。他指出：“人遇拂乱之事，愈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碍处，必思有以通之，则智益明。”意思是，遇到棘手的事情，不能急火攻心、自乱阵脚，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学会忍耐坚持，从而磨砺自己的意志，提高自己的能力；行事遇到障碍和困难，要积极思考想办法，如此才智会更广博。他还说：“疾恶之心固不可无，然当宽心缓思可去与否，审度时宜而处之，斯无悔。切不可闻恶遽怒，先自焚烧，纵使即能去恶，己亦病矣。况伤于急暴，而有过中失宜之弊乎？”意思是，面对恶人时，也要保持冷静克制，经过认真权衡后选择恰当的处置方法，如此作出的决定才不会令自己后悔。切不可闻恶而暴怒，失去公允的立场，这样作出的判断很可能存在问题。

《从政录》汇集了薛瑄平生的从政经验和感悟，反映了薛瑄家国天下的治世情怀和刚直耿介的为官节操。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等因素的限制，书中的官德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缺憾，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仍值得深入研究。



（上接1版二条）

把握“引领驱动”定位，强化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这是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对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作出的系统部署，凸显了人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地位。安徽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我们将认真履行人才工作牵头抓总职能，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发挥人才引领驱动作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实施江淮战略帅才计划，全力建设合肥国家吸引集聚人才平台，依托国家实验室、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国字号”平台，优化央地联合培养机制，先行先试一批突破性政策，大力度引育“高精尖缺”人才，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塑造人才引领发展新动能，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企业需求为牵引，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精准制定引才目录，“一链一策”建立紧缺人才和团队定向招引机制，实施十大新兴产业引育专项，创新“产教融合”培养方式，加快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聚焦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持续深化扩大用人主体自主权、科技成果所有权赋权等改革举措，完善“揭榜挂帅”“定向委托”等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推动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充分激活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优化人才精准服务，落实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制度，高标准建设江淮英才港，完善高层次人才分级分类目录，打造“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形成人才诉求“一窗受理”、人才服务“一站供给”、人才发展“一帮到底”的服务闭环，营造创新愉快的人才发展生态。

（作者系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上接1版头条）

（三）

“两个结合”是百年来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又作出深入系统全面的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提出“两个结合”，反映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客观规律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从中国的土壤里汲取养分。中国的土壤，既包括当代中国的实践土壤，也包括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土壤。实践是鲜活的，而历史文化底蕴则是根源性的，可以浸润化育，也可以常用常新。“六个坚持”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党百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经验的升华，也为我们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

“两个结合”不仅具有理论创新的指导意义，更有文明发展的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靠的就是“两个结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科学的理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成功运用于中国的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形态转化为文明形态，这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级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吸收借鉴世界一切有益文明成果，而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融汇古今中外各种文明优长的中华民族当代文明。从未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结合中才能找到正确方向。这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有信心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当代文明，而且有信心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内国际发展大势，作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为新时代我们党制定大政方针和战略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国际社会把握国际局势和世界趋势提供了思想武器。

作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有充分的现实依据。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还没有取得与资本主义如此接近的实力，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国际政治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二是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大国博弈更趋激烈，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国际秩序面临重构。三是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新洗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动。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结构和产业分工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五是全球性问题加剧，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重大安全风险前所未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能否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决定的不是一时一役的胜负，而是战略上、全局上的被动与主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应对百年变局上深谋远虑：一是强调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国家利益为重、国内政治优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把国内政治作为治国理政用劲发力的基本方向，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二是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重组的挑战。三是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在保持自身发展独立性的前提下用好外部资源。四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号召力的理念和价值主张，强调维护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应对百年变局，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正义事业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兼顾了国内和国际、发展和安全、自身发展和造福世界，体现出更加开放、更加包

容、更加普惠的鲜明特点。这对于我们在百年变局中抓住战略机遇、化解风险挑战、赢得历史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避免人亡政息、确保政权长期存在，毛泽东在“窑洞对”中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就是让人民监督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给出了第二个答案，就是党的自我革命。

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面临的难题是任何其他政党所没有的，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和平年代，我们党面临的危险更多来自内部，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牵涉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腐败的形式更加多样而隐蔽，既有理想信念方面的问题，又有纪律作风方面的问题；既有经济领域的腐败问题，又有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交织的腐败问题；既涉及国内，又涉及国际。克服“和平积弊”，跳出“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怪圈，更需要勇气、智慧和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健全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的监督体系，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

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实践证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党进行的一场成功的自我革命。

党的自我革命贯穿党的生命全过程。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党的二十大在总结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基础上，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一方面，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站位更高，内涵更全面，更能体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另一方面，强调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从制度层面去解决自我革命的政治方向、实践要求、内在动力等问题，开辟了制度治党的新境界，有利于把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这为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也为我们党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时代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智慧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化解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秘书长）